



The Teahouse, Daily Life, and Socialization: A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eahouses in Late 20th Century Chengdu

Wang Di

Abstract: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rought vitality to China, having pushed forward tremendou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in people's daily life, city landscape, and urban culture. It also created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businesses. Under such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teahouses industry revived and expanded. Taking the teahouses in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as an object of observation, we can find tha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78 to 2000, China experienced waves of the economic tide, the opening of the stock market, a hug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entering the city, many workers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ecoming unemployed, the re-planning of land, and urban demol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eople were increasingly relying on the market and public space for talking about business, exchanging information, and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life in an increasingly rich environment of business culture. Being the most basic facilities for people's daily lif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eahouses served various needs for people and thus became an ideal window for us to underst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ince teahouses could meet all kinds of needs, their numbers naturally rose constantly, and so did the pressure of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customers, teahouses constant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 service and created a more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ahouses and growth of customers, the teahouse also plays the role of a club, where friends, colleagues, acquaintances, and people of the same profession can gather and enjoy their public space. As public space, the teahouse not only meets the needs of people for leisure and recreation, but also has its contributions to increas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preserving traditional lifestyle, and enriching public life. Although today's teahouse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past, their purpose of providing various kinds of services as public space remains unchanged. Even though a large number of other forms of public space have been constantly emerging and competing for customers and resources,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eahouses in people's daily lives is still irreplacea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teahouse culture and teahouse life can still be well integrated into the new, highly competitive business atmosphere. Of cours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mercial cultur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have influenced people's public life, Chengdu's teahouse business, and their operators. If the teahouses should survive and develop, they have to manage well th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regulations, and customers.

Keywords: teahouse, Chengdu, late 20th century, socialization

Author: Wang Di received his BA and MA in history from Sichuan University in 1982 and 1985, respectively, and received his Ph.D.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n 1999. He taught at Sichuan University and Texas A&M University and is currentl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nd head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at University of Macau and visiting chair professor at Jinan University. He serves as co-editor of English journal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He specializ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Breaking up a Closed Worl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Upper Yangzi Region, 1644-1911*; *Entering the Inside of the Chinese City: Exploring History from the Lowest-Level Society*; *Time, Space, and Historical Writing: A New Social History* (ed.);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English);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 *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 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1939-1949*; and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茶館、日常生活與社會交往

——對20世紀後期成都茶館業的實地觀察

王 笛



[摘要]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社會發展帶來了活力，使人們的日常生活、城市面貌以及文化方方面面發生了巨大改變，也創造了一種有利於小商業發展的經營環境，為茶館業的復蘇和規模擴大提供了經濟和社會條件。以四川省成都市的茶館作為觀察對象，可以發現，從1978年到2000年這二十餘年間，在一波又一波的經濟大潮中，人們越來越依賴市場和公共空間，在日益豐富的商業文化氛圍中談生意、交換信息並參與社會生活；而成都的茶館與全國一樣，再次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的最基本的設施，滿足了他們對公共生活的需求，並提供了瞭解社會變化及其發展軌跡的一個非常理想的窗口。隨着茶館的發展和光顧茶館的客人持續增多，茶館又發揮着俱樂部的作用，朋友、同事、熟人、同行等都可以在茶館裏聚會，享受自己的空間。茶館作為一種公共空間，不僅適應了人們休閒和娛樂的需求，也為增加就業機會、保存傳統生活方式、豐富公共生活做出了貢獻。雖然現今的茶館與過去不同，但它作為公共空間和提供各種服務的宗旨是不變的。即使大量其他的公共空間不斷地出現，並爭奪人們的時間和資源，但茶館在人們日常生活的中心地位，仍然是無法取代的。現代社會的發展，茶館、茶館文化和茶館生活，能够很好地融入新的、充滿競爭的商業氛圍之中。當然，隨着中國商業文化的發展與市場的持續擴張，在影響人們的公共生活同時，也影響着成都茶館業及其經營者。他們要想生存和發展，就必須處理好與政府、管理者、規則以及顧客的關係。但正是他們以往這種非凡的適應能力，纔使得茶館繼續在這個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繁榮昌盛。

[關鍵詞] 茶館 成都 20世紀後期 社會交往

[作者簡介] 王笛，1982年、1985年在四川大學分別獲歷史學學士和碩士學位，1999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四川大學、得克薩斯A&M大學，現為澳門大學特聘教授、歷史系主任，兼任暨南大學客座講座教授、《中國歷史學前沿》（英文，季刊）主編，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史、文化史研究，代表性中文著作有《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主編有《時間、空間、書寫：新社會史》，英文著作有《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與微觀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的川西鄉村暴力與秩序》《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等。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使人們的日常生活、城市面貌以及文化等方方面面發生了巨大改變。從1978年到2000年這二十餘年間，中國的重點是發展經濟，在一波又一波的經濟大潮中，伴隨着股市開放、農民工進城、國企工人轉崗待業、土地重新規劃、城市大拆大建等，人們越來越依賴市場和公共空間，在日益豐富的商業文化氛圍中談生意、交換信息並參與社會生活；而四川省成都市的茶館與全國一樣，再次滿足了人們對公共生活的需求，並提供了瞭解社會變化及其發展軌迹的一個非常理想的窗口。^①

成都茶館的數量從晚清開始便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中國城市，成都市民比任何一個中國城市的居民更依賴茶館。但是，由於1949年以後的政治衝擊和政策導向，茶館業逐步走向衰落。然而，改革開放又為茶館的復蘇提供了機會。本文將根據筆者在2000年前後對成都茶館所做的實地考察，並結合其他文獻資料，着重討論改革開放後的二十餘年間，隨着城市小商業、私營企業的發展和茶館的興起，人們是怎樣回到公共空間來開展自己的公共生活的，茶館又是如何重新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最基本設施的，它在人們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怎樣一個角色。

一 街角茶館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在成都，繁華鬧市的大型茶館、茶樓自然引人矚目，但普通居民最常去的還是那些散佈在小街小巷最簡陋的小茶館。這些茶館，通常祇有一兩個房間大小，不足十張桌子。經常是朝向街面，進出口是可以開關的捲簾門，或者可以拆卸的門板。這種空間佈局，對顧客來說非常方便——當茶館擁擠不堪時，人們很容易把桌椅搬到街沿上。面對那些熙熙攘攘的過路人，不但不會讓茶客們感到煩惱，反而是看街景和觀察往來人們的最佳位置。對於那些喜歡觀察成都時髦女郎的男人們，街角茶館可能是最理想的地方，坐在街沿邊，難道不是在看一齣永不重複的城市日常生活紀錄片嗎？當筆者在茶館做實地考察時，也成為這些城市景致觀察者的一員——看到了行色匆匆的上班族，看到了悠閒的退休老人，看到了一路嬉鬧的小孩，看到了卿卿我我的戀人，也看到了街頭的爭執、城管驅逐小販、隨地吐痰扔垃圾的路人……。老年人買了菜，路過茶館便停了下來，坐下喝碗茶，與其他茶客隨便聊天，而且手還不停着，慢慢地把菜收拾停當，然後不緊不慢地回家做午飯了；也看到年輕人在茶館裏高聲喧嘩地爭論什麼問題，商人們在談生意，也有人安靜地讀報，還有人乾脆就躺在椅子上打瞌睡。

在有名的寬窄巷子重新整修之前，這裏集中了許多廉價的小茶鋪。^②在筆者拍攝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在寬巷子的牆上，有一家非常簡陋的茶鋪廣告，“茶，銅壺一元”，並配有英文，旁邊還用粉筆寫着“諸位請進”。附近有一家國際背包青年旅舍，年輕外國遊客喜歡在那裏落腳，這家如此簡陋的茶鋪竟然還是以外國人為服務對象的。在寬巷子的另一頭，可以看到一家叫做“八旗茶苑”的茶館，是因為這裏過去是老“滿城”，此名稱可以讓人們懷舊，能在這個茶館中體驗對一個正在逝去的文化的回憶。雖然現代的商業文化的包裝，已經使這樣的體驗與真正的文化傳統有了遙遠的距離。^③這個茶館看上去很氣派，裝修精緻，但幾乎沒什麼客人。就在幾步遠的同一條巷子裏，還有一個很小的茶館，桌椅都擺在街旁的樹蔭下，還撐起了一個塑料棚，有幾桌人

^① 關於改革開放後成都茶館業的變遷，筆者曾發表過若干篇中英文論文。例如，“Mahjong and Urban Life: Individual Rights, Collective Interests, and City Image in Post-Mao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 (2014): 187-210。“The Return of Public Life: The Teahouse, Urban Citizens, and Socialist State in Post-Mao China”, *Quaderni storici* 2 (2015):409-437。“公共生活的恢復：改革開放後的成都茶館、民眾和國家”，《開放時代》5 (2018) : 142—162。國內學術界的研究，偏重於人類學和社會學視角，主要有：呂卓紅：《川西茶館：作為公共空間的生成和變遷》（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03，未刊）；戴利朝：“茶館觀察：農村公共空間的復興與基層社會整合”，《社會》5 (2005) : 96—117；余瑤：《茶館民俗與茶人生活——俗民視野中的成都茶館》（上海大學碩士論文，2007，未刊）等。

^② 2003—2008年，這個區域進行了大規模重建和整修，茶館和其他設施也都高檔化，價格大幅提高，成為一個以吸引遊客為主的旅遊景點，超出了一般居民的承受能力（《讀城·寬窄巷子專輯》2008年第6期）。

^③ 關於滿城，見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hap. 2.

在打麻將，還站着不少圍觀的行人。兩家茶館外貌的高雅與簡陋、顧客的寡與多形成了鮮明對比。

2000年的夏天，筆者考察了一個稱為“集樂”的低檔茶館，並有機會與茶館主人閑聊。該茶館在大慈寺後面的和尚街，狹窄而古樸，是非常熱鬧的農貿市場。不久，這個地區便被完全拆除，重新改造，目前已成為高檔的商業中心“太古里”。“集樂”茶館祇有一間屋大小，六張桌子，室內四張，街沿放了兩張，大概有三四十把老舊的竹椅。由於屋子太小，燒水爐祇好放在主人住的裏屋。一碗茶的價格1—5元不等，最便宜者是茉莉花茶。茶館主人和他的妻子都來自鄉下，租下這家茶館打理，每月交給老闆租金幾百元，剩下歸己。主人說，開這樣一個茶館，大概需要資金六七千元。對面街沿上有兩三張桌子和幾十把塑料椅子，牆上寫一個大大的“茶”字，主人說那些茶桌和椅子並不是他這家茶館的，而是一家“非法”茶館，一個月前開張，沒有營業執照，因此不用納稅。不過，他說那家“非法”茶館生意很差，與他的這家差太遠，他家已經開了六七年。他估計，有關部門沒有取締那家非法茶館，可能以為這些桌椅是他這家“合法”茶館的。筆者在那裏與男主人聊了好一陣，男的說肚子餓了，要妻子準備午飯。她出去了不一會兒，便買來肉、餃子皮、蔬菜，在一張空茶桌上開始包餃子，似乎這個茶館也同時是她家的廚房。

周圍居民經常到茶館裏面買開水，五角錢一大熱水瓶。儘管“集樂”茶館的生意看起來不興隆，不過不時還是有一兩位顧客的，主人身兼服務員，隨時準備招呼客人，他說不少是回頭客。茶館從早上六點半開張，營業到午夜關門。每天早上，十幾個老主顧會來喝早茶，他們過去大多在同一家工廠上班，退休後便經常在茶館聚會，輪流付費。這個辦法類似於民國時期茶館中人們經常所實施的“茶輪”辦法，以增進大家的情誼。茶館對這些老客人有特別優惠，每杯祇收取八角錢。

通過對街頭來來往往的人們和這個茶館主人與客人的活動觀察，可以瞭解許許多茶館和人們日常生活的豐富信息。這個小茶館與鄰里、過路人以及來來往往的小商小販，都有着某種程度的聯繫，由此反映出來自社會各階層、各行業的人以不同方式相互聯繫和依存。透過這個經營茶館的農民工小夫妻，甚至可以看到他們的工作空間與個人生活空間是基本沒有區分的。茶館既是他們經營的生意，也是他們日常生活的場所，他們在這裏一面與顧客聊天、做飯、吃飯，一面則打理生意。他們的家庭生活就展現在顧客的眼前，不過顧客們似乎對這些已經習以為常，很少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產生特別的興趣。這樣，街道、茶館與城市裏的人聯繫在一起。在這樣的茶館裏，私人生活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界限十分模糊。這種空間使用功能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無疑使茶館主人在做生意的同時，家庭的紐帶也得到緊密的維繫。

總之，街角茶館為居民和流動人口提供了必要的服務乃至謀生機會。在這些地方，儘管消費低廉，但他們仍然能享受公共空間中的公共生活。當然，茶館不是唯一的公共生活空間，還有許多其他地方發揮着類似的功用。例如，安維克（Ann Veeck）的研究展示了菜市場發揮着“重要的社會活動中心”的作用，現在的快餐店、歌舞廳、保齡球館和公園等等，都扮演着類似的角色。^①

大約在1990年前後，成都街頭巷尾茶館的數量急劇減少，主要原因是大規模的城市拆遷與重建。但是，到1990年代中期，那些低檔茶館開始收復失地，從中高端茶樓那裏搶回了部分市場份額。低、中、高三個等級的茶館大概各有數百，針對不同的人群而提供服務。另外，還有大量的“麻將館”開張營業。那些狹窄、髒亂、喧鬧的街角茶館，則以放映錄像來吸引顧客。中高檔茶館乾淨、安靜、舒適、服務周到，不僅提供各種各樣的茶品選擇，而且桌椅和室內裝飾也比較講究，以良好的環境吸引着消費者。^②

^① Ann Veeck,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Marketplace: Food Markets of Nanjing",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08.

^② 張先德：《成都——近五十年的私人記憶》（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第59—60頁。

二 新式茶樓的興起反映了經濟的發展

1990年代，成都與中國其他城市一樣，經歷了持續的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這同時也刺激了中高檔茶樓的興起。到2000年，成都大概有八百家這類的茶樓，其中十幾家坐落在府南河邊。在二環路西延綫，許多茶樓規模大且設施齊全，營業面積多在一百平方米以上，甚至更大。大部分顧客是中青年人，他們談生意、聚會，或是約會。人們也喜歡在這些茶館提供的舒適環境中閱讀、寫作，或是處理商務。與傳統的茶館不同，這種茶樓不提供說評書、演戲或其他娛樂，祇有輕柔的背景音樂，有的還有鋼琴演奏，旨在給客人提供一個安靜的環境，並尊重客人的隱私。在低端的茶館裏，陌生人之間會經常一起聊天，但在中高檔優雅的環境中，陌生人之間幾乎沒有交流，也不會受到打擾。位於成都市中心太升南路的“華都茶坊”，據稱是成都“第一流茶坊”，也是“成都茶文化的一個縮影”。這個茶樓“處鬧市而不見鬧，顯華美而不露俗”，在裝修、隔音上都下了不少功夫，“既有傳統茶坊的遺風，又有西洋建築的格調，使人一進去便有入洞府、登雅堂之感”。大廳裏除設六個風情卡座外，還有二十餘桌散座，“寬敞豁亮，可聽絲竹之音，可觀書畫表演，可賞名家對弈”。^①

高檔茶樓與街角茶館的價格形成鮮明對比。在這些茶樓，最便宜的茶都要十元一杯，貴的有幾十元的。一個茶樓的老闆說，他不得不抬高茶價，因為光是裝修就花了三四十萬，外加不菲的水電費和其他開銷。^②一個新開的茶樓，有一千五百平方米，由著名設計師裝修設計，家具從香港進口，有中央空調和十幾個豪華私人包間，總投資達八百萬元。另一家茶樓有一千多平方米，在裝修和設施上投資了兩百萬元。這些茶樓老闆認為，祇有一流的設施，纔能增強他們的競爭力。^③

當地報紙上發表過一篇關於成都二環路西延綫一帶高檔茶樓的文章，指出這些茶樓老闆之所以樂觀自信是有原因的。第一，這一帶有十多個新的豪華住宅小區，附近都是高收入的居民。第二，周圍沒什麼好的餐館，所以茶樓用餐是不錯的選擇。第三，這個地區交通發達，成都其他區的人們很容易開車過來消費。茶館老闆說，儘管周圍集中了不少類似的茶樓，但他們沒有遇到嚴酷的生意競爭。例如，有一個茶館每天的營業額達到8000元，而且還沒有達到滿負荷。在這些茶樓，幾乎都提供包間，價格每小時收38—88元不等，更豪華的甚至每小時280—480元。為了吸引顧客，這些新開的茶樓都打5—6折。不過一些市場分析師提醒，要小心茶樓的數量供過於求，但另一些分析則對前景比較樂觀。^④

高檔茶樓有不同的經營方法。當時，成都最豪華的茶樓是撫琴路的聖淘沙茶樓，服務非常講究，服務員為下車的顧客開車門、撐傘，甚至提供泊車服務。1996年，茶樓先在二樓開業，後來從二樓擴展到四樓，有茶廳、包間、西餐廳，一杯茶大概是28—100多元不等，包廂租金每小時180—600元不等，還不包括茶水。此外，自助餐每人是48元。到這裏哪怕是最基本的消費，也是一筆不小的花費。例如，一行五人點三杯茶，每杯88元，兩杯咖啡，一杯茶加牛奶，加上一盤水果，總共400多元，這個價位在當時還是非常高的。這個茶館總投資達四五千萬，但到2000年便已收回成本。經理說，自己接待過許多重要的政府官員，還有明星和電視臺的著名主持人，這些特殊的顧客的秘密在公共空間裏能够得到充分保護，這也是私人包廂如此受歡迎的原因。聖淘沙的成功，反映了新的商業文化在成都這個內陸城市的興起。在這裏，生活水平較高或者有特殊需要的人們，尋求更好的乃至豪華的服務。與中國其他城市一樣，成都正在從長期的計劃經濟中解放出來，這種新的公共空間也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這個城市需要一些豪華和排場。

① 鄧高如：“飲茶”，《人民日報》1995-11-03；秦鴻雁：“成都：熱了茶水冷了咖啡”，《人民日報》2000-09-08。

② 余瑤：《茶館民俗與茶人生活》，第43頁。

③④ “二環路外羊西綫，大型茶樓爭着建”，《商務早報》2000-07-13。

如果說聖淘沙是最西化的茶館，那麼順興老茶館正好相反，它強調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這個城市的歷史。順興老茶館位於成都會展中心，裝修風格是仿古式的，整個茶館分為三個區域：外面是一面圓形的牆，上面是四川民間傳說的浮雕，頗能引起顧客們的興趣。裏面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茶館戲園，顧客坐在老式的木椅上一邊喝茶，一邊觀看地方戲的演出；另一部分是茶園，雖然都是在室內，但裝修得像川西的露天茶園，竹林環繞，配老式家具，經理稱大部分是從北京買來的仿古家具，甚至還有幾件曾是私人收藏的古董。2000年，筆者首次到這裏來的時候，與經理聊天，得知這個茶館在裝修和家具上面就花費了五六百萬元。由於規模大、開銷多，茶館處於虧本的狀態，但這個茶館屬於會展中心，茶館不需要繳納房租，所以維持下去是沒有問題的。茶館每天大概賣出五六百碗茶，每月大概用去三四十斤茶葉。如果要收支平衡的話，這個茶館每天需要有兩萬兩千元的營業額。三年後，當筆者再次來到這個茶館時，正值中午時分，可容納千人的大茶館裏顧客不多，隨行的朋友解釋道，成都人習慣於去新開張的場所看熱鬧，好奇心滿足了，以後就不怎麼去了，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新的地方。

中高檔茶樓的興起，反映出成都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也反映出他們更喜歡綜合性的服務模式——茶館與餐廳結合起來，喝茶吃飯“一條龍式”服務。這種變化，體現了茶館的靈活性。它們可以迅速適應新的商業模式，來滿足人們不斷變化着的需求。過去茶館是生活慢節奏的產物，但是茶樓也適應快節奏的需要，特別是為進行商務和工作商談的人們提供了方便。他們不需要先喝茶然後再去找飯館吃飯，而是在同一個地方“一條龍式”解決。還有，它們與街角茶館相比，大幅度保護了客人的隱私，但它們的價格和清冷的氛圍，也使一些顧客望而卻步，分散到了其他茶館中，包括公園和寺廟茶館。

三 茶館是公園和寺廟必備的設施

在成都，每個公園和寺廟至少都有一家茶館。不少人到公園或寺廟，並不是去遊玩或者拜神，而是去坐茶館，因為這些地方的茶館環境優美，地方寬敞，空氣清新。如果親朋好友計劃到公園或是寺廟中聚會，他們一般都在茶館裏先碰頭。例如，武侯祠的結義樓，條件優越，有庭院和戲臺，茶價適中，一杯茶便宜的5元，最貴的30元。用電爐燒開水，但是用傳統的蓋碗茶具。

大慈寺裏的文博大茶園在成都頗有名氣，由文博藝術旅遊公司管理。1992年，這個公司經營了茶館、餐廳、寺廟內的小吃店，吸引了許多顧客。人們來文博茶館裏聚會或休閑，花上三五元便可以待上一整天。茶園每天可以賣出八九百碗茶。1994—1996年間，生意最好的時候一天可以賣出上千碗茶。^①

大慈寺還有一個大慈莊茶園，門口立有一塊牌子作為廣告：“大慈莊，茶，飯，棋牌，10—15元，要一天。時間：8:00—22:00。”中間那個“茶”字特別大，告訴人們這是一家茶館，不是飯館。其實，這是一個茶館與飯館一體的茶園。走進圓形拱門，裏面為一院子，右邊是一搭有藤架的迴廊，陰涼下擺有八九張麻將桌，桌上放着麻將，客人都在餐廳，圍着五六張八仙桌吃飯，估計有五六十人。左邊有一小池塘，池塘中間有一亭，亭裏有一麻將桌和木椅若干，池內有魚。一位四十歲左右穿黑衣的婦女端茶給筆者的時候，我說，“10—15元包吃、包喝茶、包打麻將，這麼便宜？”她說，“也是沒有辦法，競爭壓力大，沒有多大賺頭，而且從早忙到晚”。她還告訴筆者，“每天會有魚販送魚到此，放入池裏，顧客可以隨時吃到活魚”。看來，她是老闆，說了一聲“請慢慢喝”，便忙去了。筆者坐在那裏喝茶的時候，見一個廚師用網從池裏撈出兩條大魚提到廚房，看來是有顧客點了新鮮活魚。

文殊院是成都最大的佛寺，那裏的茶館主要是為朝拜者、參觀者提供一處休息的場所。營業

^① 呂卓紅：《川西茶館：作為公共空間的生成和變遷》，第62—63頁。

時間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半，價格也很大衆化，最便宜的是茉莉花茶，每杯五元。我看到茶館裏居然還售酒，這顯然不符合佛教教義，似乎也反映了哪怕是廟裏的茶館，其服務也是與信仰分開的。文殊院對老年人免費開放，所以大部分顧客是老年人，特別是老年婦女。這個茶館不允許打麻將，以免太吵鬧，但可以玩撲克牌。過去茶館一天的銷售額可達到上萬元，但自從文殊院被列為重點文化遺產保護單位後，門票上漲，茶客急劇減少，每天的銷售額降到了一兩千元。^①

寺廟中的茶館幾乎與宗教信仰無關。對茶館來說，寺廟祇不過是有穩定客源的生意場所；而茶館對於寺廟來說，不過是為拜佛的信徒或遊客提供了方便。中國的寺廟總是與茶館配合默契，因為兩者都是公眾聚集和娛樂的地方，創造了宗教信仰與世俗化生活結合的完美模式，哪怕是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以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浪潮，也未能摧毀這樣一個傳統模式的存在。

人民公園坐落在市中心，是最受老年人歡迎的地方。“鶴鳴茶館”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露天茶館，茶客們在竹林樹蔭下享受公園的景色。而且，這裏價格也很大衆化，每杯茶5—30元不等。^②2003年，筆者在成都考察時，去了草堂寺的一個茶館。草堂寺是成都著名歷史遺迹，很受外地遊客和老年人歡迎。但是，門票要30元，老年人免費，因此成為老年人鍛煉和散步的樂園。草堂寺的茶園價格8—50元不等，茶是用傳統的三件套（茶碗、茶蓋、茶船）端上來的，牆上挂的是木漆雕刻畫和詩，主題都與茶有關。在草堂寺的另一家檔次較低的茶館，筆者也看到一些老人在打麻將，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買茶喝，有的是喝自己帶的茶水，這樣，他們既可以享受公共生活的歡愉，但不需要買茶，祇需要付很少開水錢便可以了。這是茶館經營靈活的又一個很好的例子。

傳統的街角茶鋪、茶樓、公園和寺廟中的茶園，都有着悠久的歷史。但不少低檔茶館順應物質文化的發展，開始出現了轉型。這一時期，茶館在功能上與過去已經有所差異。例如，不少變成了茶館兼錄像放映室，特別是在1980—1990年代非常流行。不過，隨着有線電視走進千家萬戶，外加盜版的影碟受到政府保護知識產權的打擊，這些錄像廳便逐漸從公共場所消失了。

四 多功能的市場與商業文化

茶館能夠適應日益增長的多功能需求，導致了茶館數量的增加，也使茶館面臨着更多的競爭壓力。為了吸引更多的顧客，茶館提供了更舒適的環境。懷特（William Whyte）指出：“想要讓一個地方有人氣，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它變得有吸引力。”^③懷特的意思是，如何創造出理想的舒適環境，但是沒有提到這樣做的代價——更高的成本。2000年《華西都市報》便調查過茶館的經營狀況。調查者在夏天的下午來到府南河旁的一家茶館裏，那裏有110張桌子，400把椅子，茶價每碗5—20元不等。服務員告訴記者，該茶館前幾年生意很好，顧客們買價高的茶也不在乎，但這些年由於經濟不景氣，他們錢也花得少了。與街角茶館相比，高檔茶館似乎更容易受大的經濟環境和人們生活水平變化的影響。^④

不同類型的茶館，採取不同的方式，成為新興的消費文化的創造者。隨着競爭的加劇，茶館越來越注重自身的形象與宣傳。2003年，第一屆“茶館形象”比賽舉行，除了選舉“茶花”之外，還有五十多位參賽者參加比賽“茶藝”——特別是摻茶的表演。^⑤競爭是一種商業活動，但這種競爭無疑也普及了茶文化，並為大眾提供了娛樂。這些現象表明，茶館再次適應了新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環境的變化，隨時可以採取新的商業策略，以圖生存和發展。它們為增加就業機會，

① 余瑤：《茶館民俗與茶人生活》，第19頁。

② 關於鶴鳴茶社的歷史，見Di Wang,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43-45, 61, 88, 175.

③ William H. Whyte,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New York: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1980).

④ “露天茶園搶了茶樓生意”，《華西都市報》2000-08-21。

⑤ “她們當選‘茶花’”，《天府早報》2003-10-26。

保存傳統生活方式，豐富公共生活，做出了貢獻。雖然現今的茶館與過去不同，但它們作為公共空間和提供各種服務的宗旨是不變的。即使大量其他的公共空間不斷地出現，並爭奪人們的時間和資源，但茶館在人們日常生活的中心地位仍是無法取代的。現代社會的發展，茶館、茶館文化和茶館生活，能够很好地融入新的、充滿競爭的商業氛圍之中。

在1980年代，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在這個轉型過程中，相應的服務設施也應運而生。^①國有企業的生產原料是有所保障的，但私有企業則必須通過市場來得到它們的原料。改革開放初期，各種生產資料短缺，例如煤炭、鋼鐵、木材及其他許多設備，都需要政府部門特批，這給了相當一些有門路的人獲取暴利創造了機會，時人稱他們為“官倒”，經常是一紙批文，便賺得盆滿鉢盈，不少如今的富豪，都是那個時候賺下了第一桶金。

在這個時期，茶館又恢復了它1949年以前的功能——商人和小販的市場。根據1984年《人民日報》一篇文章的觀點，茶館已經成了快速發展的城市市場經濟中的一個重要的場所：“從清談清耍中產生出‘實業精神’來——談商務、傳信息、論桑麻，商業熱浪彌館。”^②一些茶館實際上已成為了鋼鐵、水泥、汽車以及其他生產資料的交易中心。

據1987年6月4日出版的《成都晚報》報道，由於有了茶館做生產資料交易中心，小廠小公司的採購員們，不需要長途跋涉到處去尋找供應商，祇需要直接到茶館，一切便可以搞定。一位女採購員所在的公司急需兩噸某種特型鋼材時，她在茶館裏很快發現了賣家。一個鄉鎮企業的採購員，公司需要材料時，便到茶館來，每次都不會空手而歸。他認為，茶館對小企業來說，真是非常重要的。有意思的是，在這裏活動的採購員、銷售員們，因為有更多的渠道與商業信息，甚至還為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原材料購銷牽線搭橋。茶館則從每筆交易中收取1%的回扣，建立了很好的聲譽，人們誠信交易，沒有欺詐。一位經營者表示，大家都努力建立這個市場的信譽，不會損害他人的利益。這使得全國經濟信息網成都分部也考慮在這裏進行供給需求調查。

1990年代，有十幾個地方商會在成都成立。例如，來自浙江溫州的商人，以經商頭腦而聞名，他們便在成都建立了溫州商會。這些商會大多沒有自己的活動場所，所以把茶館作為他們的活動中心。^③這樣，不需要專門租用辦公室或會議室，會員聚會非常方便，茶水不需要準備，來早來遲也不要緊。茶館聚會，既可以商談事務，也可以休閒和聯絡感情。

由此可以看到，茶館作為一種公共空間，不僅適應了人們休閒和娛樂的需求，還發揮了市場和辦公室的功用。在某種程度上，茶館為商人們提供低成本且合適的場所，幫助他們獲得信息，相互聯繫，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在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提供一些場所以適應市場的需要，而茶館作為一種現存的基礎設施，發揮了它們新的功用，也得到政府的認可。儘管20世紀最後二十多年發生了劇烈的政治、經濟、文化變革，出現了其他的公共空間，還有科技和物質文化的發展，但茶館的市場功能卻從未被取代過。

五 共同愛好人群的聚集

隨着茶館的發展和光顧茶館的客人持續增多，舊茶館的多功能性開始恢復。例如，一些茶館發揮着俱樂部的功用，朋友、同事、熟人、同行等，在茶館裏聚會。還有一些茶館，提供獨特的服務。例如，棋藝專業人士與業餘愛好者切磋的茶館，就成為了棋園。

茶館經常既是人們私人交往的場所，也是情侶第一次約會的理想之地，無論是年輕的還是年

^① Lowell Dittmer and Lance Gore, “China Builds a Market Culture”, *East Asia* 3 (2001) : 29.

^② 戴善奎：“茶館”，《人民日報》1984-08-19。

^③ Regina Marie Abrami, *Self-Making, Class Struggle and Labor Autarky: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in Vietnam and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2) ,16.

老的人們，都可以在茶館尋找他們的浪漫。^①一位三十五歲的婦女描述她日常生活的時候，經常提到茶館，就是在這裏，她遇到了真愛。^②另一位年紀較長的崔先生，從1980年代早期開始，便和妻子經常光顧茶館，先是在人民公園附近的一家茶館，後來喜歡到另外一家，還經常帶着外孫去，小孩在茶館中度過了從三歲到十歲的童年時光。崔先生是歌詞作家，喜歡在茶館裏寫作，人群和喧鬧不但不打擾他的思路，反而經常給他以靈感。他經常光顧府南河邊的一個茶館，在那裏認識了一位與他女兒年齡相仿、離異的女服務員。那位女服務員沒有受過很多教育，字寫得很難看，崔先生便教她寫字，兩人的關係逐漸親密，後來崔先生離了婚，與那位女服務員生活在了一起。

茶館也是文人聚集的場所。作家何小竹回憶，他第一次到成都的茶館是1983年，經常去的是公園茶館或街角小茶館。那時電話還沒有普及，他經常與他的朋友——多數是詩人——先騎自行車到朋友家，但並不進去，而是在路邊把朋友叫出來，大家便去街角茶館待半天。^③茶館成為定期聚會的地方。在1990年代中期，“明清茶樓”成為了“他們的起居室、會客廳、編輯部、棋牌之家、愛心小房和伙食團”。一些暢銷書就是那裏寫出來的。何小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中有一些情節就是以這個茶樓為背景，還寫了一個題為《明清茶樓》的短篇小說。^④根據詩人翟永明的記載，一些成都詩人“睡至中午，約在香積厨茶樓打牌。一般是鬥地主，地主一鬥就是一下午……基本全都進入忘我境界”^⑤。作家王躍並不喝茶，但喜歡待在茶館裏。茶館經理和服務員都認識他，祇要他走進門，他們就會說：“胖子又來了。”然後倒一碗開水給他，聽顧客的聊天和觀察他們的言行，經常會給他靈感。他宣稱自己是一個“老茶客”，寫了一本名為《老茶客閑話》的書。^⑥流沙河每週四上午都要去大慈寺的文博大茶園，直到中午纔回家。車輻經常在那裏會朋友，直到八十歲身體不行了為止，坐茶館習慣是他童年時就開始養成了，那時他父親去茶館，經常帶着他。^⑦

瓊瑤在她的小說《幾度夕陽紅》中，描寫了四川的茶館，不過關於四川茶館的印象，她是從朋友那裏聽來的，並沒有第一手的經歷。1980年代，瓊瑤為了“尋根”來到成都，她記得兒時的家是在暑襪街，但她找不到老家的院子了。接待她的朋友帶她去了一個老茶館，她發現這裏與她想象的大不相同：它坐落在商業區的一條小巷子裏，就像一個過去學校的禮堂，裏面很熱鬧，幾乎全是年長的顧客。茶館的前面是舞臺，桌椅擺成行，桌子上擺茶碗。根據瓊瑤的描述，節目很精彩，有川劇、荷葉、滑稽戲、大鼓、竹琴，茶館外面也圍滿了看節目的觀眾。^⑧

茶館也是人們參加打圍鼓活動的好地方。這項自發的大眾娛樂在1950年代曾被禁止，改革開放後便在各個茶館和公園內恢復了。文博大茶園提供多種娛樂，觀眾祇需兩三元茶錢，便一邊啜茶，一邊觀看節目表演。茶園中有兩支主要的業餘表演隊，一個是玩友協會，每週五下午表演；另一個是蜀聲琴社，每週日下午表演。^⑨舞臺上有兩個橫幅，一個寫着“蜀聲琴社演唱會”，一

^① Martin King Whyte, “Changes in Mate Choice in Chengdu”,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1-213.

^② 她與未來的丈夫第一次相遇，就是在茶館裏。那時，她和朋友們在茶館聚會，她接到電話，要她要去另一個茶館作業務商談，他聽到了她的對話，主動說要送她去，於是他們由此相識，並很快相愛了(張逸仙：“孤寂中誕生的‘愛情’”，《商務早報》2000-04-26)。

^③ 何小竹：“成都茶館記憶”，《華西都市報》2005-12-11。

^④ 何小竹：《成都茶館：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06)，第31頁。

^⑤ 翟永明：《白夜譚》(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第12頁。

^⑥ 王躍：《老茶客閑話》(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第2頁。

^⑦ 呂卓紅：《川西茶館：作為公共空間的生成和變遷》，第66—67頁。

^⑧ 瓊瑤：《剪不斷的鄉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0)，第165—167頁。蓮花和打道琴都是過去成都傳統的民間表演。

^⑨ 呂卓紅：《川西茶館：作為公共空間的生成和變遷》，第63、73頁。勤耕：“‘玩友’與玩友”，《四川戲劇》3 (1988) : 45—46。在改革開放後，這些組織興盛起來，參見劉厚生：“關於民間職業劇團的幾點思考”，《廣東藝術》1 (1997) : 21—24；蘇敏華：“民間職業劇團在演出市場中的地位和作用”，《福建藝術》2 (1998) : 9—10。

個寫着“成都市川劇玩友協會”。

這些協會非常活躍，會員定期在茶館聚會和表演。位於牛市口得勝下街的一家茶館，一些川劇玩友在那裏坐唱了十多年。這個茶館保持着過去的風貌，設施簡陋，但玩友們樂在其中。六十多歲的林先生，父親是老悅來茶園的雇員，幼時母親常帶他到這裏找父親，大些後自己也經常去。如果父親沒下班，他就溜進戲園看戲，天長日久，跟演員們也混熟了，耳濡目染，他成了川劇迷，不抽煙喝酒打麻將玩撲克，川劇是其唯一所愛。1958年，他參加了業餘川劇團，經常在書院南街的第一文化館唱小生和拉胡琴。“文革”中他不敢再唱，實在忍不住了，就騎自行車出城，在田野練嗓子。改革開放後，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在茶館打圍鼓了，有時一天要去不同的茶館趕場。1995年他退休後，便加入了青羊區玩友協會的同樂分會，又唱又拉，積極參加和組織玩友活動，精力都耗在了玩友活動中，家裏人對他的痴迷都很理解，並不加阻撓。^①

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老年人在公園裏，或是附近的健身場所跳舞、打太極拳等健身活動，但想要花費不多的社交、聚餐、喝茶、打麻將這樣的活動，茶館則是老人們的首選。所以，人們常說茶館“多半是老人的天地”，因為他們有充足的時間，想在茶館裏待多久就多久，可以和朋友們或是陌生人閑聊。^②成都老郵工協會的會員們，每個月都在茶館裏聚會。協會設會長和通訊員各一名，現在是第三任會長，八十二歲了，但是在這個團體中，還屬於年輕的。成員多時有四十多人，少時二十多人，已有九人去世。大家來去自由，自己付茶錢。協會每月八號活動，但如果有會員過生日，大家一起湊錢給壽星祝生，先在茶館喝茶，然後到飯館吃飯，壽星就不用出份子錢了。逢年過節，協會都會到大慈寺茶園聚會。過去他們到悅來茶園，但由於價格上漲，所以轉移到了文博大茶園。^③在2000年夏天，筆者在文博大茶園考察的時候，觀察了一群老年婦女的聚會。她們在露天喝茶，午餐時到室內餐廳吃飯，坐十人桌。午飯過後，又回到茶桌上繼續喝茶，有的坐在桌子周圍，邊聊天，邊玩起麻將來。

對於一些老年人來說，茶館是唯一的消遣地。一位老茶客從1977年便開始光顧茶館，他每天早上7—8點在茶館喝早茶，然後纔去上班，下班後也會在茶館裏待上幾個小時再回家。退休後，他經常一整天都待在茶館裏，要麼從家裏帶午飯來吃，要麼買碗三四塊錢的麵條吃。^④林老先生已經八十多歲了，從眼鏡店退休後，覺得無聊，於是家人帶他去大慈寺的文博大茶園散心，他便成了茶館的常客。平日裏，子女要上班，他自己來，週末和子女一起來，暑假還帶他的孫子來。他喜歡坐在大殿的屋檐下，安靜地喝茶冥想，沒有妻子的嘮叨或孫子的打擾。服務員知道他喜歡安靜，總是留下一個熱水瓶讓他自己隨時倒熱茶。老先生有時也和別人聊天，基本都是關於眼鏡的。另一位楊先生，六十多歲，退休前是中學的數學教師，喜歡文博大茶園的“文化氛圍”。後來他搬到了北門附近，離大慈寺很遠，但依然每週坐車去茶園裏見朋友。還有一位書法愛好者，喜歡坐在挂滿繪畫和書法的前院，邊喝茶，邊欣賞那些作品。對他來講，坐茶館就像是在參觀一場藝術展。^⑤

綜上所述，通過對1978—2000年這二十餘年間成都茶館與人們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關係的實地觀察，筆者看到了茶館所反映的政治控制寬鬆，經濟和文化的勃勃生機，它可以說是觀察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個視窗和棱鏡。茶館作為一個傳統的公共空間，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劇烈發展變化的時代，仍然能在成都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使人不得不嘆服一些文化和日常生活傳統所具有的適應能力。當一些文化傳統在時代的變化中逐漸消失，而另一些傳統有用

^① 張先德：《成都：近五十年的私人記憶》，第193—94頁。

^② 戴善奎：“成都泡茶館”，《人民日報》1998-07-10。

^{③⑤} 呂卓紅：《川西茶館：作為公共空間的生成和變遷》，第69、71頁。

^④ 余瑤：《茶館民俗與茶人生活：俗民視野中的成都茶館》，第27頁。

二〇一九年 第四期

的則能夠跟隨時代的變化及時進行調整。

這個關於成都茶館業的考察也顯示出，並非一切傳統都是與現代化不相容的。其實，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處在商業化、全球化時代，都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衝擊，但是，人們的生活方式在變化的同時，也仍然受到其傳統的制約。而這種傳統的制約力量，並不需要國家權力的幫助，就可以發揮強有力的作用。因為，大眾文化有着頑強的生命力。有些東西似乎表面上衰落了、消失了，但一旦給予它們適當的土壤和條件，就可能像雨後春筍一樣，迅速走向繁榮。茶館業的復蘇，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當然，隨着中國商業文化的發展與市場的持續擴張，在影響人們的公共生活的同時，也影響着成都的茶館業及其經營者。他們要想生存和發展，就必須處理好與政府、管理者、規則以及顧客的關係。而在協調這些關係中，他們一方面能夠接受新的事物，另一方面保留茶館經營的特點和傳統優勢。根據成都市政府在2018年底公佈的數據，開業的茶館已接近一萬家。雖然這裏有成都市區和管轄範圍擴大的因素，但反映出茶館這個行業仍在繼續發展卻是不爭的事實。正是這種非凡的適應能力，纔使得茶館業繼續在現代化的浪潮中繁榮昌盛。

·學術微信·

澳門大學舉辦“第二屆濠鏡思想家論壇”

2019年10月24—27日，由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南國學術》編輯部共同主辦的“第二屆濠鏡思想家論壇”在澳門大學崇文樓G019室舉行。這次論壇的主題是：“多樣文明之共和共享共生”。論壇開始前，澳門大學副校長、《南國學術》編委會主任蘇基朗與各位出席者握手並致開幕詞，他代表校長宋永華祝賀論壇的順利舉辦，希望出席論壇的專家學者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內在理解與溝通貢獻智慧和方略。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代主任朱壽桐致歡迎詞，代表主辦方熱烈歡迎各位學者的光臨，同時介紹了中國歷史文化中心的發展概況。開幕式和閉幕式均由《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主持。

應邀出席論壇的嘉賓有：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王一川，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肖鷹，北京師範大學哲學院教授沈湘平，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程廣雲，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沈國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陸揚，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紫江學者”特聘教授黃純艷、哲學系教授陳贊，上海師範大學知識與價值科學研究所教授何雲峰，南京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周曉虹，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周憲，湖北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江暢，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哲學系教授張俊，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教授劉志偉，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曉華，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教授張志慶。

論壇召開期間，代表們圍繞四個議題(多樣文明之間實現共和、共享、共生的可能性；“地球村”減少/避免“文明衝突”之路徑；東西方智慧寶庫中的文明共和、共享、共生思想資源；澳門在東西方文明相遇、碰撞後實現融合與共鳴之經驗)進行研討和交流，並且產生了一批學術成果。論壇閉幕後，這些成果將以論文集形式編輯出版。